

日據時期韓國新興宗教正道教研究 —以基督教影響為中心

朴秉勳(首爾大學)

I. 序論

韩国天主教始于李承薰于 1784 年在中国北京受洗归国并形成教会共同体；韩国新教则在 19 世纪末随着安德伍德 (Underwood)、阿彭泽勒 (Appenzeller) 等外国传教士入境而正式兴起。1907 年平壤大复兴运动在国家动荡之际通过韩国信徒对罪的忏悔促发觉醒，发挥了强烈的影响力。人人欲借悔改之泪，创造新国；新教不仅传来了新时代的文明，也在当时韩国的宗教格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受到新教影响的韩国新宗教值得关注。韩国新宗教始于 1860 年水云崔济愚创立的东学；此后出现了甌山教团、天道教、大倧教、圓佛教等多种新宗教。这些新宗教，尽管怀抱对近代新纪元的渴望，却在日本强占的阴影下，利用既有思想资源，探索韩国及韩国民族的救赎方案。其中一个特点是，新宗教所依托的思想资源里，新教也占有很大比重。

本文中，我们借李顺和 (1869 ~ 1939) 所创之“正道教”这一宗教，观察日据时期朝鲜的宗教地形。



图1. <現 正道教>

崔重铉在韩国弥赛亚运动史开端即提出正道教，这里“弥赛亞”一词指“被认为从神那里领受特殊使命之人”。正道教是一种新教系新宗教，它综合了以《郑鉴录》为代表的秘术信仰，以及儒教、

佛教、道教三教，其中新教影响尤为突出。

李顺和 1869 年生于庆尚南道居昌县，18 岁出嫁，1913 年与丈夫一同迁至满洲奉天省。她经传教妇人信新教，1917 年借神的指示，于满洲奉天创立正道教。其后于 1919 年 6 月 26 日，在首尔四大门与朴气运、李元根、秦应洙、田汝秀、卢元长等人一同升挂正道教象征的绿十字旗与八卦旗，发动反日独立万岁运动。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 1924 年定居于鸡龙山新都案，开展教团活动，直至 1939 年逝世。

本文拟通过分析正道教的思想内容与特征，探讨新教对韩国宗教，尤其是新宗教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将考察《郑鉴录》思想，特别是其中“弓弓”观念与新教思想的交汇，以及新宗教的时运观念在新教系新宗教中的接受与转化等问题。其中会查看既有的《郑鉴录》影响；正如东学将“弓弓”作为其核心概念，新教也在“弓弓”中寻找基督教意义，此点颇为有趣，并显示接受新的宗教思想并非全盘的。

II. 十字架与《郑鉴录》的弓弓

十字架对于十八世纪访问北京天主教堂的朝鲜使臣来说，是一种极为陌生而奇异的物品。朝鲜儒者洪大容（1731-1783）曾对此作如下评论。

明萬曆時。西洋利瑪竇入中國。其教始行。有所謂十字架者。教中人必禮拜之。以爲西主受此刑而死。可笑。西教中主意。盖多不經語誑惑。¹⁾

然而，对于天主教信徒而言，十字架（十字架），尤其是带有苦像的十字苦像（十字苦像），却是他们极为珍视的信物——他们或从中国输入，或亲手制作，随身携带。在当时天主教遭受迫害的情境下，这些十字架仍在信徒之间作为信仰的象征秘密传播。随着时间推移，那种对十字架的陌生印象也逐渐转化为亲切的感受。

十字架与韩国本土信仰的正式相遇，始于以《郑鉴录》为代表的“秘记图讖信仰”在新宗教与基督教中的展开。对于朝鲜末期秘记图讖的影响，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鏞（1762-1836）曾作如下批评。

忽歎獻誦道誦《秘記》、《鄭鑑讖》說曰：“某年兵必起。” 曰：“某年獄必興，將血流成川，人種以絕。” 勸其婚友，鬻田宅棄墳墓，入深山虎豹之窟，以俟其難。²⁾

《郑鉴录》严格来说并非单一的书籍。它是若干预言未来灾祸及其时机、并记述避灾方法的各种秘记书的总称，世人通常将这些书统称为《郑鉴录》。其基本情节是“李氏所治的朝鲜将灭亡，而郑氏所治的新国将在鸡龙山建立”。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些秘记书中出现的“弓弓”一词的含义颇为关

1)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 卷二，「乾淨衛筆談」

2) 《茶山詩文集》11，「五學論5」

注。例如，在1748年没落两班李之曙等人的“挂牌书事件”中，就出现了如下说法。

‘道說有秘記矣，龍頭蛇尾云云。龍頭，即戊辰正月，蛇尾，即己巳臘月。’又曰，‘似倭非倭，自南而來，非山非水，利於弓弓。所謂弓弓，未可知也。’³⁾

‘似倭非倭，自南而來，不利於水，不利於山，利於弓弓。此邑有大人，名將’之云云，‘若不出於此，則其禍必大矣。’⁴⁾

其中“弓弓”的具体含义虽不明，但被用作避难、躲避未来灾祸的象征。依李之曙一党的任意解释，“弓弓”意指如弓腰般弯曲处，意为“避难时当藏于家中”，或“前往宽阔之地”等。换言之，“弓弓”原本指涉某种空间意义的场所。然而，到了东学时期，“弓弓”经历了意义上的专有化（appropriation）。作为韩国最早的新宗教——东学的创教者水云崔济愚（1824-1864），曾就“弓弓”吟咏如下。

拾起奇异的《东国谏书》说道：

「已去壬辰倭乱时是利在松松，

嘉山定州西贼时是利在家家。

啊，世人哪，学着这些事来，

且图谋生活之计吧。

秦国的录图书说‘亡秦者胡也’，因此曾虚筑防胡，

二世亡国之后，世人方知其事，

我们也在这世上试试利在弓弓吧。

卖官卖爵、凭势谋道者一心向弓弓；

钱谷累积的富佃知（一类官名或富人）亦一心向弓弓；

流离乞食、败家者亦一心向弓弓。

闻风便动的人也或往弓弓村寻去，

有人进万叠山中，有人入西学而入道。」⁵⁾

这里“东国谏书”指朝鲜的《郑鉴录》类的秘书记；“利在松松”“利在家家”两句将1592-1598年的壬辰倭乱与1811年洪景来之乱联系起来。所谓“利在松松”指的是壬辰倭乱时期来援朝鲜的明将李如松；“利在家家”则因洪景来之乱发生于冬季，逃难者有人冻死，由此而得名。作为指示在灾难中求生之法，后来留下了“利在弓弓”这一说法，人们对“弓弓”作各种解释。因此有人依地形前往“弓弓村”，有人皈依西学（即天主教）。但东学并非如俗人所想那样把“弓弓”理解为某地理空间或天主教之类的宗教，东学暗示“弓弓”专指其自身教团。东学认为将来会有瘟疫流行、天地如再

3) 『英祖實錄』67권, 英祖24(1748)年 5月 23日

4) 『英祖實錄』67卷, 英祖24年(1748) 5月 23日

5) 「夢中老少問答歌」『龍潭遺詞』

开辟般的大时运到来，因而人应入东学。东学把其教团的符籍（教团称灵符）显示为弓弓，并通过灵符治病视为从天主（上帝）所受的使命。

曰：不然。吾有靈符，其名仙藥，其形太極，又形弓弓。受我此符，濟人疾病。受我呪文，教人爲我，則汝亦長生，布德天下矣。… 到此用病，則或有差不差。故莫知其端，察其果然，則誠之又誠，至爲天主者，每每有中，不順道德者，一一無驗。此非受人之誠敬耶。⁶⁾

灵符为天主所赐予水云崔济愚的两种主要手段之一，另一为咒文。此灵符的目的是使病者痊愈。前文所云“十二诸国怪疾运数再开辟”，言及随时运而至的怪疾危机，灵符即为在此情形下可用的治病方法。然而灵符并非药物，服用后并非人人皆能痊愈。将灵符用于病者之法为。⁷⁾ 有的人病得以痊愈，有的人却未能痊愈。探究其原因后发现，凡为天主献上诚心与恭敬之人，其病皆得痊愈；而未能如此者，则无灵验。可见，这与咒文相同——（“领受我的咒文以教化人，使之为我”）——灵符亦与“为天主”的意义相连。崔济愚以“弓弓”的形象呈现灵符，并通过将其与奉天主的诚意相结合，遂将原本出自《郑鉴录》等秘记图讖中的“弓弓”一词转化为东学的核心教理并加以专有化。

但在东学初期，“弓弓”尚未明确地与“十字架”联系起来。然而东学的思想更进一步深入探讨各种秘教书，而到了二十世纪初，由金周熙、金洛世于1915年在庆北尚州创立的后期东学教团“东学教”中，则开始出现将其与十字架相联系的倾向。

在传自《东国讖书》的文字中说：

“松松、家家虽已过去，但当时能顺应时运，如今来的时运岂会不中？

至今时节，新的运数——‘利在田田’——又将到来，

若能以‘道下止’应时运而成功，则当及早觉悟，

于《弓乙经》中实现其意，明悟‘弓弓’之理致，

那不正是‘亞字之道’么？细观‘亞字’，白十字分明；

比之白十字，则又仿佛‘田田’二字。

东学教同样重视“利在田田”这一传自秘訣的句子，与“利在弓弓”并列。教团首先将“弓弓”与“亞字”相连，因为两个“弓”字背向相合，形似“亞”。继而又将“亞字”中间的空白联想为“白十字”，再从其中寻得“田田”的形状。⁸⁾ 这种将“十字架”与《郑鉴录》秘訣句相连接的现象，在基督教中亦可见到，颇为耐人寻味。

“我们大韩同胞常常信《郑鉴录》中的话，四处寻找鸡龙山、十胜之地、弓弓乙乙之间与道下止

6) 『東經大全』, 「布德文」

7) 在纸上绘灵符，焚之，取其灰与水 and 服。

8) 参见朴炳勋《东学校歌辞》中所体现的东学思想的延续与变容——以秘訣、时运、圣人观念为中心》，第66页。

之所，因此在忠清道、庆尚道、咸镜道、全罗道间奔走的人甚多，然而却从未有人找到过。……我们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中‘亞伯拉罕’（Abraham）之名，其中兼具‘十胜之地’的‘十字’与‘弓弓乙乙’之字。‘亞字’中间的白线分明是‘十’字，凡信主之十字架之处，皆为‘十胜之地’；而观‘亞字’左右之画，则‘弓弓乙乙’之形清晰可见，故当穷究圣经。所谓‘正道宁’，即‘正’字、‘道’字与‘宁’字，意谓以正道而行则得安宁；又可释为‘道下止’，即上帝借‘郑鉴’之名，预先使民知主之十字架之道理也。”⁹⁾

这是一位读者发表于《基督新闻》（The Christian News）的一篇文章，主编为奇一（J. S. Gale）。作者在文中论述了他所发现的基督教与《郑鉴录》之间的关系。玉圣得指出，该读者从亞伯拉罕（Abraham）的汉字名首字“亞”中看出了“十”字，即十字架的象征，并认为“十胜之地”指的就是信仰十字架的教会；“弓弓乙乙”象征着十字架的形状；“正道令”则意味着“信奉耶稣教则得安”。玉圣得进一步强调，这种平信徒的预言式解释被传教士与韩国基督徒所接受，并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开来。¹⁰⁾ 上述引文的特点在于，它将《郑鉴录》中出现的先知郑鉴视为基督教十字架真理的预备者。正如东学以“弓弓”为其核心概念一样，基督教也从“弓弓”中发现了基督教的象征意义。这显示出新的宗教思想的接受，并非完全否定或割裂既有的宗教土壤，而是在其上生长、转化的过程。

Ⅲ. 正道教中的十字架与旗帜

李顺和本是新教信徒，然于 1917年（丁巳年）3 月 9 日未时，在满洲奉天蒙受神的启示，创立正道教。首启示言论中包含：直到1917年为止，是先天罪恶时代；此刻必须升扬绿十字旗与八卦旗；若如此，天下万国将成为大同国，享受天国之福；若不如此，则在二至三年间天下万国将全部消亡。于是作出诸多指令，例如收回天下万国之军器，日本也必须收军器，与朝鲜订立平等条约，日本为日本，朝鲜为朝鲜，各自保其疆域为主。这些在最初启示中的内容，后来不断通过启示重复。在这里值得注意者：第一，是关于时运（时势运数）的教导；第二，是重视绿十字旗与八卦旗这些旗帜；第三，是对强占朝鲜的日本发出警告。当时日本将朝鲜作为殖民地，朝鲜在其下处于绝望境地。

其中，首次提出警惕日本的教示这一点，是正道教思想中极具意义的特征之一。正道教于 1919 年全国性的独立运动中与教徒一起，在首尔四大门升挂绿十字旗与八卦旗，开展反日运动，因之被囚；由此可见其对日本的对抗意识之浓厚。

9) 『基督新聞』, 1906年 3月 21日.

10) 玉聖得, 『韓國 基督教 形成史』,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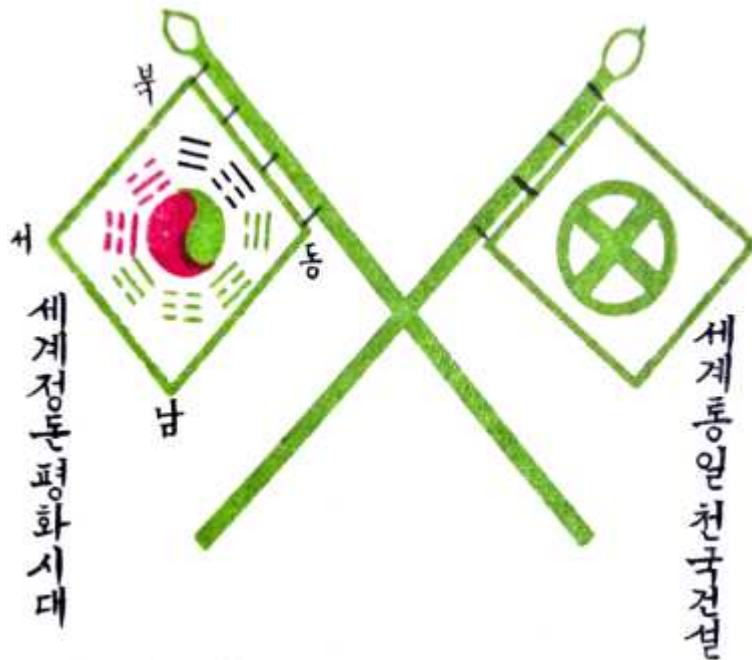


图2. <綠十字旗與八卦旗>¹¹⁾

那么，这“绿十字旗”和“八卦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初的启示中，关于绿十字旗与八卦旗有如下记载：“此旗乃天下万国之标志，故先天所用之旗一概废除，此旗将为天下万国所用，当牢记于心。其法：十字之色用绿色，八卦旗则东南为绿色，西方为红色，北方为赤黑色。此意象征如无果树发叶开花，乃腐败之世中新世界的征兆。”（《正道教法文》第一章）这段文字不仅明确规定了旗帜的颜色与样式，还赋予其象征意义——如同无果树萌芽开花，象征着从腐败的旧世界中诞生出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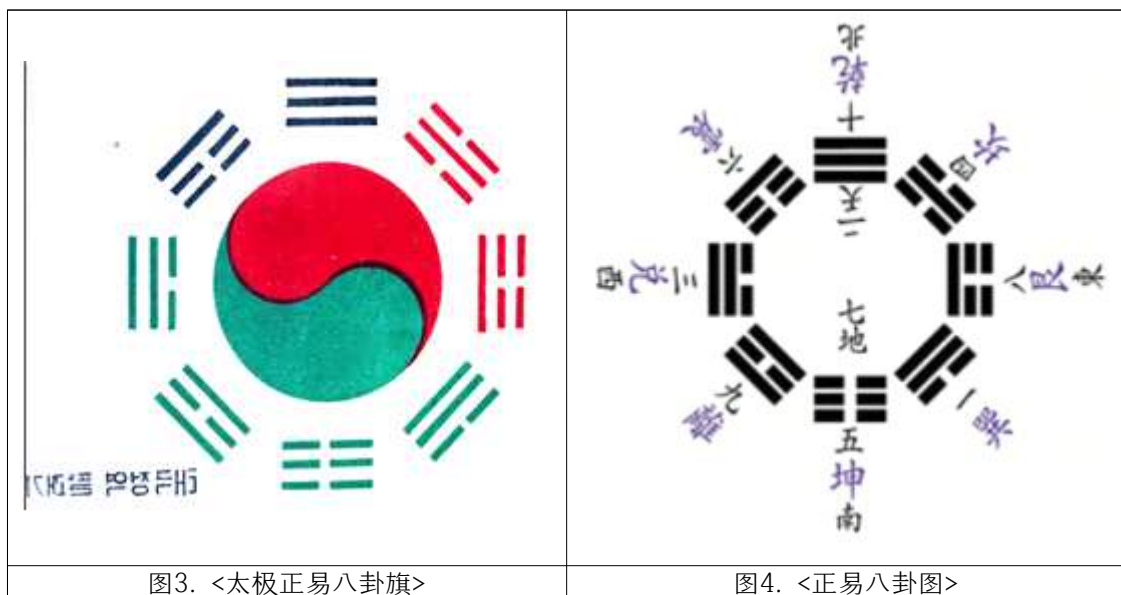
随后，在1917年7月7日未时的启示中，又责备信徒不知何时应当升起绿十字旗，也未遵命行事，并详细指示了制旗之法：“你们每个人都应持有十字旗与八卦旗。旗底为圆形白地，字划为绿色；尺寸长广各五寸，旗杆长九寸，佩于右胸。太极旗亦同样为圆形白地，太极之色：东方为绿色，西方为红色，北方为黑色。”¹²⁾

值得注意的是，绿十字旗仅使用绿色，而八卦旗则使用红、黑、绿三色，并且八卦旗亦被称为“太极旗”。其八卦图的排列与一夫金恒（1826-1898）所绘的《正易八卦图》完全一致。正道教的一个分派“正道教大本营院”更将该旗正式称作“太极正易八卦旗”，足见其渊源。

金恒（1826-1898）以创制“正易八卦图”著称——继伏羲之先天八卦与文王之后天八卦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正易”体系。通过此图，他以易学的方式界定“先天”为旧世界，“后天”为将来的新世界，建立起先后天思想的理论结构。由此看来，正道教藉“正易八卦旗”展现出其对先后天运观的一种理解。然而，这种吸收似乎仅止于名义与象征层面，未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思想。关于正道教的时运观，将在第四章再作讨论。

11)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聖歌』 1.

12)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14:4



至于正道教升起绿十字旗与八卦旗的时机，《正道教法文》第三章、第十四章、第十六章与第二十四章中均启示为1917年9月9日。在中国安东县那些散居的朝鲜民族民众被召集之后，于 9 月 8 日夜丑时，有“航行于朝鲜”至朝鲜汉城之命令。此乃如耶稣扛十字架往各各他山，尽责任之意。（“天下各国散居百姓者啊，扛十字架于此日同来聚集”，“即便从心里起，也要肩负十字架，赴各各他被钉之心志坚定者，方能入天国天堂乐园”）随后，于1917年9月15日再次得到启示，指示于1917年的最后一天，即腊月三十，先在安东县集合，再前往汉城，从东门（东大门）进入。这一指示，一方面体现了将朝鲜视为“生门方”，即在灾难中亦能幸存之地的意涵，但基本上意味着升起独立旗的象征意义。然而在1917年的丁巳年，行动最终未能实现。

随后，于1918年戊午年1月4日子时，又有责备未完成的任务的启示下达，但升旗之举直到稍后才付诸实施。以李顺和为首的正道教信徒于 1919年6月29日在东大门举起绿十字旗与八卦旗，以此批判日本，展开反日斗争。结果，他们被日本当局逮捕，李顺和因此遭受三年半的牢狱之苦。1923年出狱之后，正道教不再关注“朝鲜独立”这一现实课题，而转向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方向发展。由于1924年迁往鸡龙山新都案，其与社会的隔绝愈加明显，宗教的神秘性也因此更加凸显。此后，正道教分化为多个体系，如：李顺和之子秦永洙领导的正道教总本部，正道教大本营院，以及朴己云的正道教等。其中，正道教大本营院的特点在于其诠释更深受《郑鉴录》式秘记图讖说的影响。¹³⁾ 在原本李顺和的正道教中并不明显的要素，在此被积极地以《郑鉴录》的方式扩大解释。在这种语境下，十字架重新获得了新的意义。

在正道教大本营院中，“十字架”（十字的象征体系）被用来与“运数”联系起来。他们称罪恶世界的代表为“黑色十字”与“赤色十字”两种运数，而后天地上天国则为“绿色十字运数”。此外，他们将《郑鉴录》中的“弓弓乙乙”以拆字方式解读为无形与有形的十字，象征天地父母；并将“利在田田”解释为：应当以十字为中心侍奉天地父母。又例如，秘记图讖中所谓能避灾的十处圣地——“十胜地”，他们认为其中的“十”并非指十个地方，而是象征天地父母之十字（绿色

13) 「改新教係 新宗教 正道教 研究」, 首爾大 碩士學位論文, 2024, 71.

十字)。这种解释方式显示出他们对《郑鉴录》思想的继承与重新诠释。相较于前文第二章所讨论的李顺和本部正道教仅隐约显露《郑鉴录》式因素的情况，正道教大本营院则更积极地强化了这种解读，并在此过程中使得“十字架”从基督教象征转化为更具韩国宗教土壤意义的符号。

IV. 正道教中的时运与亚当

时运在韩国新宗教中是一个重要特征。韩国第一新宗教东学相信，像“再开辟”这样的时运危机将来到，但若克服此类时运，将迎来人间仙境。为克服之道，需要敬天主与行道德。进入20世纪后，许多新宗教都持有灾难将至及其后果世界之时运观，这与日据时代之境遇结合，更具号召力。这些时运观常用“先天”、“后天”、“开辟”等术语来说明：即当世之为“先天”，未来之世为“后天”，将这两者区分之事被称为“开辟”。

正道教同样具有时运观，在这一点上继承了韩国新宗教的传统。其时运被划分为五个时代：创造时代、罪恶时代、天国时代、空中时代，以及再次出现的罪恶时代。每一时代以九万年为一个周期单位。前两个时代——创造时代与罪恶时代——属于先天，而后三个时代——天国时代、空中时代、罪恶时代——则归属于后天。

先天		后天		
太初 九万年 创造时代	罪恶时代 九万年 王国时代	天国时代 九万年 光明世界	空中时代 九万年	罪恶时代 九万年

表1. <正道教时运观>

太初时代指天地初开的时期。据称，此时“神”以言语创造了天与地及万物。在创造完一切之后，神又造了亚当（Adam），并在造亚当后的第四日，取其左肋骨创造出名为夏娃（Eve）的女性。

罪恶时代为1917年丁巳年之前的世界，被称为“先天九万年”。这是因夏娃之罪而形成的时代，期间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传统宗教被视为为下一时代作证的宗教。“丁巳年”既象征先天的终结，亦象征审判与灾难降临的时期。天国时代自1918年戊午年开始，即为现今的世界。这是上帝为了拯救万民而向李顺和降下启示的时代。此时代旨在消除先天之罪，净化人心，常被描述为“天地九万年”或“光明世界”。同时，这也是为下一个空中时代作准备的时期。¹⁴⁾ 空中时代被描绘为摒弃物欲、在光中工作而实现的世界。¹⁵⁾ 此外，还提及一个后天罪恶时代¹⁶⁾，此时代在空中时代九万年结束后，由于玛利亚（Maria）之罪而降临。¹⁷⁾

一般而言，韩国新宗教的时运观假定宇宙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变化，并试图预测天运更替。旧的、堕落的世界被称为先天，新的、美善的世界被称为后天。从先天向后天过渡的过程常伴随着

14)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47:9

15)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47:9, 47:13, 47:14.

16) 《正道教法文》第50章第4节

17) 《正道教法文》第9章第7-8节

后辟（開闢）、灾厄与试炼。正道教亦沿袭此种结构，显示出与韩国新宗教的共通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道教中融入了来自改新教（即基督教新教）的“罪”概念。也就是说，在正道教中，关于亚当与夏娃的叙述与时运思想密切相关。

据正道教经典记载，亚当是在太初时代末期由神创造的，其后神取亚当的肋骨造出了夏娃（第21章）。神曾呼唤他们，但二人未回应，因此未得相见。丁巳年三月九日，亚当终于与神相会，他自述因夏娃的奸淫之罪，自己也陷于罪中，并请求上帝另造一位洁净、纯净的女子。但神以“一男一女”为原则，拒绝了他的请求，并表示本应赐予亚当的启示，将在九万年期满之时——即丁巳年——交予一位贞洁女子。据此，先天九万年的世界原是亚当与夏娃享乐之境，但因其不孝而堕为罪恶世界。由于二人性的原罪，人类皆被视为生而有罪。

我创造天地万物之后，为万物之主造人，其名为亚当与夏娃。此一男一女，为万物之主时，我无价而造，无价而赐，天下十八亿生灵皆其子孙。然而，亚当与夏娃因在我前不孝，故先天九万年间，未成乐世界，反成罪恶世界。又因他们男女间不正之行，所生子女无一例外，各自背负如山之罪业。此罪为何？其最重者为何？其曰：第一为奸淫罪，第二为嫉妒与纷争，第三为贪欲，第四为物欲、贪心与情欲。杀人之罪皆由奸淫而起，因此诸罪，人类如陷水火之中。¹⁸⁾

应注意，按照时运划分的时代性质并非自始就被预定的。从正道教的视角来看，亚当因为没有回应天父的召唤而犯下了不孝之罪；又因夏娃所引发的两性行为，使全人类背负原罪，从而生活在罪恶的世界之中，而非乐世界。本来，韩国新宗教中所出现的时运观多半是具有预定周期性的，但因“性的堕落”而导致时运更替，这显然是正道教所具有的基督教性特征之一，也是一大显著特色。这里巧妙地结合了韩国本土思想与外来观念。此外，将伊甸园（Garden of Eden）事件解读为性堕落的象征，也是所谓“神灵派”韩国基督教系新宗教的共同特征之一。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正道教可被视为此类“性的伊甸园诠释”的先驱。

之后，神命令亚当在罪恶时代期间下凡受罪，随后在丁巳年施行世界审判，并与他一同在“空中世界”中生活九万年。此时，夏娃被描绘为在无日无月的黑暗地狱中度过。¹⁹⁾

在罪恶时代九万年中，亚当曾以耶稣的身份转世，钉死在十字架上；此后以“保惠师”的形象存在，后来又将以“新星（새별）”之名，转世为李顺和之子。

在正道教中，认为耶稣之所以被钉死，是因为其母玛利亚（Maria）的罪，这一点颇为特殊。

李顺和于1917年2月16日怀孕，并于2月20日接到关于怀孕的启示而自觉。然而，她声称“怀上了神的儿子”而被其他基督徒殴打，导致3月15日流产。²⁰⁾ 原本，这个孩子——亚当——肩负着拯救世人的使命，²¹⁾ 并承担执行世界大审判的职责，²²⁾ 这些都是在太初就已约定的。然而，由于所谓“证据者”朴己云的情欲之罪，正道教认为，作为亚当与耶稣的“新星”最终未能降生。

18)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69:2-3

19)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9:4

20) 「改新教係 新宗教 正道教 研究」, 首爾大 碩士學位論文, 2024, 16-19.

21)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9:4

22)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11:6

“九万年间，第一次出生时名为耶稣，因玛利亚之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次出生时名为黎明之星，更加光明美好，但因证据者的罪也无法实现。此罪为何？乃因证据者违背我的命令而取情欲之罪。”²³⁾

虽然经文中出现了亚当的多重角色，但其中亦可看出与《郑鉴录》的“真人”观念相联系的要素。在李顺和所受的启示中，《郑鉴录》中极为重要的地点——鸡龙山被反复提及。²⁴⁾ 在天国时代、即自丁巳年开始的新世界中，“神将居于鸡龙山”。²⁵⁾ 当时，鸡龙山在普天教与侍天教等教团中亦被视为圣地。据传，普天教教主车京石（1880~1936）将在1924年甲子年于鸡龙山登极为天子，引起社会轰动。在《郑鉴录》等秘记图谶中，鸡龙山被认为是李氏朝鲜灭亡后，新的真人出世并建立新都的地点，因此吸引了诸多韩国新宗教聚集于此。在正道教中，鸡龙山自1917年起便被视为神圣之地。

“今年之内，天下万国将互相贯通，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年、新的月将降临。以往九万年的旧世皆将废除，从明年起将是新世界。在冬至腊月，将分辨羊与山羊；明年起，右边为羊，左边为山羊。山羊将被带往鸡龙山筑基建都。”²⁶⁾

由此可见，自首次启示的1917年起，鸡龙山便被赋予中心地位。在1918年开始的新世界来临之前，于1917年冬至腊月进行的“羊与山羊的分判”被解释为审判；象征不义者的“山羊”则被迫为将建的新都——鸡龙山——筑基。

“鸡龙山之都邑，九万年受富贵荣华，四方设珍珠门，羊群出入其门，而山羊不得入。速速建成，明年起历八年，至三月初九日未时，我的儿子亚当将登极。”²⁷⁾

在这一审判结构中，鸡龙山之都的东西南北之门象征神圣空间：“羊之群”得以进出，而“山羊”虽筑其地，却不得入其门。据预言，李顺和所生之亚当（或称“新星”）将于1918年后第八年，即1926年在鸡龙山登基为帝。这种认为“真人将在鸡龙山建国”的观念显然受《郑鉴录》的影响，而将其时间定为1926年3月9日则颇具独创性。

1920年代初，甑山姜一淳（1871-1909）与普天教车京石等人皆有类似说法，称将在1924年或1929年于鸡龙山、井邑建国。相较之下，正道教的“亚当登极说”更早出现，颇为引人注目。然而，由于“亚当／新星”流产，此登极说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以当时广泛流传的“郑道令”

23)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9:6

24)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22:1

25)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22:1 “此一历史，我在太初已定：后天之九万年，我将居于名为‘朝鲜’之国；

我所居之处，乃鸡龙山。”

26)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8:10 (1917.4.5.)

27) 正道教總本部, 『正道教法文』 8:11

概念为基础，正道教将其改称为“正道令”，并解释为“神将在鸡龙山弘扬正道”，而非“姓郑的童子”²⁸⁾

这反映出正道教对当时鸡龙山与郑道令传说的接受与改造。原本应由李顺和所生的亚当／新星，作为天国时代、鸡龙山时代的真人形象出现；但在其流产后，正道教认为神将亲自坐镇鸡龙山发令。虽然教义上否认这是“姓郑之人”，但被称为“代天主”的教主李顺和，极可能被信徒视作此“真人”之化身。无论如何，关于鸡龙山与正道令的信仰关系，不仅在日据时期盛行，在解放后亦以圣歌形式继续在教团中传唱与运作：

第11节：好啊，好啊，鸡龙乐园真好啊，迎接鸡龙乐园，高唱欢迎之歌。

第12节：在鸡龙乐园的圣殿中，正道令降临，生命之光与荣光之光，明如日月。²⁹⁾

V. 結論

西方新教传到韩国后影响深远，亦成为新宗教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催生出新的宗教思想。继李顺和的正道教之后，韩国的弥赛亚运动史通过南方女王、新主派（金圣道）、朝鲜耶稣教会白南柱、向新耶路撒冷朝圣的黄国柱、以生列修道院金百文、新坛正道会丁得恩、天父教朴泰善等人物展开。这些新教系新宗教运动，有时受社会非议，但也是韩国宗教地形的鲜明组成。

本文通过正道教，考察新教在韩国宗教地形上的影响。这影响通过与既有的时运观与以《郑鉴录》为代表的秘术（非讲道而含“十字架”意象）、东学等既有思想的多样结合，形成正道教独自的思想。通过“来自神格的新启示”这一现象，李顺和在日据时期黑暗之境况下呼喊独立，并为此入狱。朝鲜的独立运动即使在神秘形态中于宗教内部展开，亦是有趣之处。

新教历经此类过程融入韩国宗教中，至今仍对新宗教产生重大影响。新教与韩国宗教思想之间的交涉与沟通这一课题，尚未被彻底阐明。我相信，通过像正道教这样至今未被广泛关注的韩国新宗教之资料与思想，这些点将逐渐被揭露。

28) 《正道教总本部·正道教法文》68:16-17 (1923.7.28)

29) 『正道教聖歌』「46章 鷄龍運正道令歌」